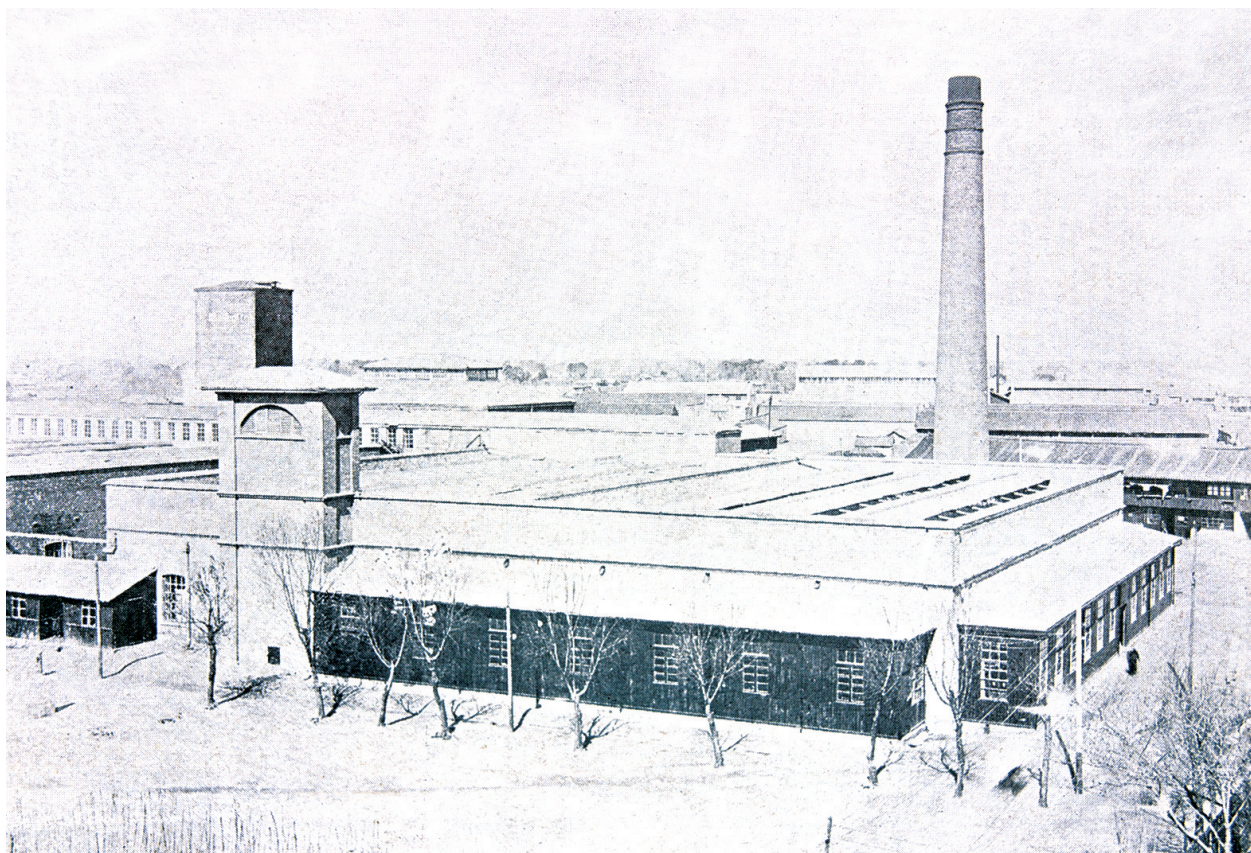


大生纱厂“辛亥九月”发行的钞票

□庄安正

大生纱厂计划发行十万元钞票,实际发行了“三万余元”。但是,这“三万余元”纱厂钞票,在南通“辛亥九月”及以后发挥了救济金融、稳定人心、促进工商业发展等积极作用。



大生纱厂

档案里的张謇

南通市档案馆 王斌

大家对淮海实业银行在1920年1月发行的三种钞票(十元、伍元、一元)比较熟悉。事实上,南通更早在“辛亥九月”,即19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,以大生纱厂名义发行过上述面值的三种钞票,这事较少有人提及。

特殊时期

众所周知,钞票发行权归银行。南通“辛亥九月”以纱厂名义发行钞票,是在特殊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。10月10日,武昌起义爆发后,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响应,大多数省份“趋于共和”,张謇亦顺应潮流,完成了从立宪到共和的历史跨越。11月8日,在张謇安排下,沪军都督府派狼山镇前总兵许宏恩率民军乘轮抵通,并于夜“七时入城”,协助南通和平光复。本地民众则“出城欢迎,道傍夹观者,男妇老幼约有万人,军民过处,拍掌之声如雷”。以张謇任总司令的军政分府总司令部随即成立,南通遭遇了千年一遇的特殊时期。

南通光复后,附近各县纷纷响应。

但是,局面远未稳定,南京尚在清政府军队手中,南通除治安问题严重外,“金融异常恐慌,所持以为援济之沪镇各银行、钱号均各停止汇兑”。“辛亥九月”正值南通新棉登场,因“汇划不通,市面衰败,民以棉花、大布上城求售,各庄皆因缺乏现款,停止收买,以致数日之间花价骤跌十余元,布票跌五六角”,严重影响纱厂运转与民众生活。另外,新政权经费开支,尤其是维持社会治安“军饷一项……省垣既无款可领,地方即不能不自为谋,当此人心惶惶,万一应因无方,致生哗变”。官商都希望总司令部尽快决断,“首谋救济金融,由财政处发行一种钞票,以资流通”。

特殊对策

军政分府总司令部下辖军政、民政、财政、司法等处。发行钞票,不仅事关财政处,而且成为总司令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。如果关注历史细节,我们可发现,张謇、张謇在南通光复前已预测到这一金融风险,并提出了应对方案。11月2

日,《新闻报》透露,大生纱厂准备发行钞票,“藉以活动市面。已于日前在商会集议,由官商赞成,不日即将通行”。报道没有点明南通何人提出了解决方案,但显然只有张謇、张謇拥有以纱厂名义发行钞票的决策权。《张謇日记》显示,10月23日夜,张謇从上海返回南通,29日晨赶往上海。中间在南通五天,张謇与张謇以及其他官商有所接触。故这五天,最有可能是张謇、张謇等商发行钞票的五天。南通光复后,预测成了现实,方案进一步完善,并作为特殊对策加以实施。

方案内容包括:第一,由财政处发行三种面值钞票,“共十万元以为购花之用,藉以活动市面”;第二,钞票以纱厂名义发行,以纱厂作为担保,缘于担心民众对总司令部“不甚信用”,故“暂由大生纱厂发行”;第三,钞票“限于通崇海之境流通”,“允各庄号,在本境交易及完纳赋税,一律通用”;第四,惩治伪钞,票面上印有“如有伪造,送官究治等字样”;第五,可以兑换银元,“复指定兑换处所……票面注明‘凭票即付’字样”;第六,规定钞票限于“辛亥九月”印刷发行。“一俟大局平定,仍由该厂兑现收回。”

存世七年

大生纱厂计划发行十万元钞票,实际发行了“三万余元”。但是,这“三万余元”纱厂钞票,在南通“辛亥九月”及以后发挥

了救济金融、稳定人心、促进工商业发展等积极作用。钞票印刷发行原限于“辛亥九月”,民国建立,“总司令部撤销后,即已停发,嗣后均为逐渐收回者时期”,故纱厂钞票在南通市面存世只可能一两年,事实上却存在近七年。之所以流通较长时间,大致有两方面原因:

第一,纱厂钞票虽属临时性钞票,但纱厂为状元张謇所创,且就在民众身边存在,民国后又日见兴旺发达。将钞票与纱厂的信用与资产关联,在民众中可信度就很高,加以使用、兑换都很方便,“商家以便利关系,仍一律通用”。第二,张謇、张謇眼钞票在南通市面上流通顺畅,商民称便,亦默许其继续存在,没有采取限期回收等强制性措施。“人民信用已深,乐于存放,不即兑兑”,南通社会甚至出现了专门收藏纱厂钞票的“藏票之户”。

变故发生在1917年5月,江苏省议会召开期间,有议员对南通长期使用纱厂钞票提出质询,南通“奉省令停止行用”,回收步履加快。纱厂两次通告民众限期回收,截至1918年6月,仅剩“洋四百余元未兑”,宣告全部退出南通金融领域。

大生纱厂钞票不仅是张謇、张謇顺应潮流,谋求南通共和的见证,也是一种珍贵的钱币类文物。只是,这种钞票“辛亥九月”发行量不大,1918年回收结束时又绝大部分遭销毁,不知今天还有没有极少量存世,并为南通或外地的钱币爱好者收藏。(作者单位:南通大学)

张赐宁《涛声万树图》

□徐继康

气也极大,伊秉绶为之题额,此匾至今尚在,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书斋号中的名品。

张赐宁与南通州颇有渊源,据光绪《通州直隶州志》卷八《秩官志上·文职表一》记载,在嘉庆十年(1805),张赐宁由监生出任南通州管河州判,直至嘉庆二十年由安徽芜湖人廖登甲接任。张赐宁生于乾隆十三年(1748),他到通州任职时年已五十八岁,这时段对一名画家来说,正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时期。另据该志《官制》记述,从乾隆三十三年到道光二年,南通州的粮补州同被裁革,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张赐宁当时虽只是个俸银四十五两、养廉银六十两的从七品,但他这个州判却相当于南通州的二把手。他与不少当地人都有交游,比如与丰利的陈嵩,曾合作过《四季花

卉图》,又为之画《枯木寒鸦图》。张赐宁离开南通州后,并没有回老家,而是留在扬州卖画,著名画僧蓬溪就是他的再传弟子。

不知为何,如今的张赐宁名气远逊从前,固然比不上罗聘,甚至比起蓬溪来也有所不及,他市场上的表现与其在画史上的地位严重不符。翻看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》,可知国内多家博物馆对其作品极为珍视,南通博物馆也收有他的《枇杷图》与《柴门夕阳图》扇页。前几年,当我见到此幅《涛声万树图》时,便倾囊买下。取到画后,发现裱褙的签条上写有“先舅秦陵公所赠故物,初覆装裱后记”,画中也钤盖“范初庵收藏书画碑帖”朱文印,才知道此画原是海安范初庵先生的旧藏。楚弓楚得,这在收藏中,真没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事了。

海安街巷改名轶事

□程太和

轰轰烈烈的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,为海安城区主干道的中坝路亦更名为“大寨路”,与此相适应的,中坝桥更名为“大寨桥”(即现在海安海陵公园旁边的“中坝桥”),中坝路菜市场更名为“大寨路菜市场”。

当年,除了上述几条有影响的街巷名、路名更改外,还有十多条路名、街巷名也作了相应更改。

永安路更名为大庆路,复兴路更名为东风路,交运路更名为胜利路,宁海路更名为红卫路,中市后街更名为幸福路,东大街更名为东风街,中大街更名为红旗街,西大街更名为建设街,如意巷更名为东风巷,三元巷(前身为耿德和巷,亦称“耿善人巷”)更名为立新巷,日新池巷更名为利民巷,县府巷(前身为衙门巷)更名为红旗巷,旗杆巷更名为红星巷,交流巷更名为胜利巷,大顺巷更名为胜利东巷,益人巷更名为兴无

巷,西寺巷更名为新风巷,草坝巷更名为同心巷,下坝桥更名为团结桥。中心居民区更名为红旗居民区,宁海居民区更名为东风居民区,永安居民区更名为前进居民区。

1981年12月29日,海安县革命委员会(1968年4月至1982年1月,县人民政府称“县革命委员会”)下发《关于海安等县属镇部分街、巷、桥及居民区命名更名的批复》的文件(海革[1981]360号)。文件指出:根据国务院(1979)305号《关于地名命名、更名的暂行规定》和江苏省人民政府(1980)1176号《江苏省地名工作管理暂行规定》的精神,经研究同意海安镇十七条街、十五条巷、二座桥、三个居民区;曲塘镇二条街、李堡镇二条街、二条巷的命名更名。同时,附有三个县属镇的路、街、巷、桥、居民区命名更名表。至此,海安更名的路、街、巷、桥等地名又重新恢复成了老地名。

史海回眸

渡槽:
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忆

□姜松延

渡槽即高架水渠,是一种跨越峡谷、河流、洼地和交通线路等障碍物的输水建筑,它能让水流在越过阻碍后到达目的地。

上世纪中期,落后的水利影响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。于是,作为一种水利设施,渡槽在全国各地得到大规模兴建……但这一工程建设以交通运输不便的山区为多,在地处平原的南通则较为少见。

笔者所在的原南通县四安公社8大队(后称蒋桥村,今属阌家庵村),是一处由四条河流合围而成的南北狭长状的地块,另有一条小陈家港河,弯弯曲曲由左上方流入,从右下方流出,将全大队14个生产队中的9—13队及14队的东半部抛在大队部所在地的河东。大队原有老机灌站(以柴油机为动力)一座,位于9队现S225省道加油站东北河边。为改善灌溉条件,加之该大队已实现通电,1970年,大队部在位于中心地带的第7生产队选址,建造了一座电灌站,购置不同马力的电动机三台,并对安装口径不等的抽水管与水泵。出水口上端即电灌站正面是八个标准的槽体大字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,由小学教师羌树堂用水泥精心粘贴而成,因字体凸起且以漆描红,故更醒目。为了让所有生产队都能享受到新电灌站带来的便利,扩大农业灌溉水资源收益面,大队领导在规划时即决定,要自力更生,配套建造渡槽一座,以解决河道阻隔带来的渠水输送问题。

这项水利工程以大队织布厂历年积累的盈利作为资金保障,人力资源则依靠本大队社员。于是,在电灌站建成后,被集中起来的瓦、木匠,在瓦木工俱精的资深匠人王宗汉带领下,有的制作木模;有的预制桥桩、桥板及槽底;再以红砖、水泥砌成槽身侧面;其他的青壮劳力靠船和小推车,加上肩挑背扛,运送钢筋、水泥、砖块等建筑材料。尽管是“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”,但他们不畏艰难,敢于钻研。虽说没有机械设备,但他们土法上马,硬是打造出一项精湛坚固的工程,成为当年全村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建筑,也是全公社闻名的交通、水利精品工程。渡槽开工于1970年冬,如期在第二年建成并投入使用。到开闸放水、渡槽正式开通的那一天,人们兴高采烈、敲锣打鼓,俨然节日一般。经实测,该渡槽长27.8米,槽身宽、高均为1.3米。因渡槽上面铺有桥板,具备“桥上交通,桥下过渠水”的双重功能,社员们也称之为“渡桥”。而作为地名,附近大队(村)的社员或村民多喊作“八大队渡槽”或“八大队渡桥”。

该渡槽选址于河西6队与河东10队之间的碾坊桥河面,渠水由电灌站沿水渠笔直向东,经6队后过渡槽流入河东的10队,并在此分别向南将渠水送至9队,向北送往其他3个半生产队。渡槽启用后,不仅满足了小陈家港河两岸的农田灌溉用水需要,还为当地百姓的出行通畅与交通安全提供了保障。此外,自建成后连续使用的四十年间,渡槽从未出现过渗漏。同时,纵然桥下有无数船只穿行,桥上有各种机动车辆通过,该渡槽也未见有明显受损。其建筑质量之高由此可见。

长虹卧波,甘霖畅流。这座渡槽不仅见证了本地农业、水利发展的起承转合,给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,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童年印记。

不同于上学时的着急忙慌,放晚学途中的我们有的流连于此的时间:正当灌溉时,或是扔下叶片枝条,比试谁的最先被冲出;或是坐在渡槽头尾,任渠水冲刷双脚;若是没能系牢鞋带,便会在小伙伴的哄笑中到“下游”去追赶被冲走的凉鞋。暂停灌溉时,会借着渡槽桥板缝隙投射进来的亮光,抓上几只小鱼、小蝌蚪,有时还会用带茶的“盐水瓶”等容器装回家。最难忘的是在凛冽寒风中,我们这群衣衫单薄的孩童,总要位于中途的渡槽里躲避一阵,然后像加满油的机动车,从渡槽东口冲出,一路飞奔家中。

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,尤其是农田水利灌溉设备的普及,渡槽的功能逐渐削弱。虽然一条PVC管加一台水泵就能够取水,但该渡槽在全村农田灌溉中仍继续发挥着主体作用。直到2011年新S225省道施工建设,渡槽因其东侧的水渠被截断而致功能被废。2012年底,交通部门拆除了其槽身,在紧靠的残存槽底北侧,建造了一座宽大的桥梁。这座足以代表一种信念,一种与天斗、与地斗豪情的渡槽就此消失了,但在我们以及上辈人的记忆中,它不仅是一个水利工程,是一道无法抹去的乡村景色,更是一个难忘的岁月烙印,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记忆。

历史人物

富宦张朝缙忆清俭

□海华

袁枚是清中期文坛巨擘。他结交多位如皋文人,其中便有张朝缙。《随园诗话·补遗》中称赞:张松园朝缙先生,受知于福敬斋公相……口不谈诗,而兴到偶作,迥不犹人。令袁枚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张朝缙的诗才,还有他的多位妻妾。其中有位叶春芳,最得张朝缙宠爱。叶氏向袁枚索诗,引来其余妻妾氏不满。

张朝缙,如皋人,出任泉州府厦门同知、河南粮盐道、浙江布政使、甘肃布政使等职。据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《清代职官年表》等史料记述,乾隆三十七年(1772),张朝缙通过捐贡步入仕途。从捐贡到纳妾,张朝缙又曾管理浙江、甘肃两省财务,颇为富有。不过他赞赏过节俭的生活方式,这就与他成群妻妾中的沈氏有关。

翻开友人家中所传《林梓沈氏家乘》及手头保存的《候选州同知沈公攀兹暨原配钱太夫人墓志铭》,林梓沈攀兹与续弦陈太安人生有七女,其中六女儿嫁给张朝缙。不知道当年妒忌袁枚为叶春芳作诗的妻妾中是否有沈氏?不过张朝缙对林梓沈氏族人很是尊重。乾隆甲寅年(1794)秋,他为《林梓沈氏家乘》作序,述其遇到淮南、上东、浙江、福建等地沈姓人士,总要向他们打听其族起源。张朝缙还为两位丈母娘写传《钱太夫人、陈太夫人传》,诠释了墓志铭中两位妇人的美德。这位陈太夫人生活节俭,对于张朝缙清俭为官生活应有过影响。他在《钱太夫人、陈太夫人传》有过记载,陈太夫人治理家政,克勤克俭,不事奢华,不耽逸乐。家中两兄七女一团和气。尽管丈母娘已经离世,但是陈太安人生前不苟言笑的形象还浮现在张朝缙的眼前,她的教诲也常在张朝缙的耳边响起。丈母娘的俭朴形象给张朝缙留下深刻印象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传家宝

在我家客厅里,常年悬挂着一张山水条屏,每有朋友来,都会看好一会儿,看画中的山,看画中的树,看山间的云气,看树梢上的流水,看草庐中的高士,最后去看左上角的那首诗:“涛声万树浪长空,幽崕横茅复几重。不解泉流何处注?深山送出午时钟。”诗后为落款:“十三峰草堂居士张赐宁志于邗上”。看到这里,朋友总会回过来说:“这个张赐宁是谁?”

张赐宁是何许人?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。如果放在清代乾隆年间,一定有人人会大笑:“你怎么连他也不知道?”确实,只要对清代书画史稍有了解的人,对张赐宁这个名字肯定不会陌生。他字坤一,号桂岩,河北沧州人,是诗人张逢尧的侄孙。他还有一个身份,是纪晓岚的

表弟,那幅著名的《河间中堂纪文达公遗像》就出于他的手笔,此幅是目前公认最可信的一幅纪晓岚画像。根据《墨林今话》《艺舟双楫》《扬州画苑录》《墨香居闻识》《桐阴论画》及《清画家诗史》诸书记载,张赐宁“幼习工笔,王宸一见叹其笔妙,授以六法,以故山水气魄沈雄,用笔爽健,雅近石涛,而多不泥旧法,惟以气韵过人。曾宴谷赠诗极为倾倒。陈云伯论画目为北派大宗,至以龙象譬之。花卉超逸,着色花卉独称绝技。工墨竹,兼善人物”。他初游京师之时,即与罗聘齐名。不仅精通山水、人物、花卉,他的行、楷亦入人品,还能作诗,著有《黄花吟馆集》《十三峰草堂诗草》,诗名还不小,雅与画称。他那个“十三峰草堂”,当时名

地名掌故

“文革”时期,海安有人贴出大字报,说海安的街巷大多以姓氏命名,封建家族色彩太浓,与社会主义性质不相适应,必须更名。于是,海安将部分街巷名、路名予以更改。

苏家巷更名为“反修巷” 苏家巷位于海安西大街草坝西边,紧邻城西小学。上世纪60年代,前苏联与修正主义是联系在一起,人们称苏联为“苏联修正主义国家”。紧靠在培养社会主义新苗学校的巷子就是“苏家巷”,很不恰当。于是苏家巷改名为“反修巷”。

蒋家巷更名为“反帝巷” 蒋家巷位于海安西大街草坝东边,紧邻海安明道小学。蒋家巷西侧即为明道小学东围墙。台湾的蒋某人追随美帝国主义。明道小学紧邻蒋家巷,蒋家巷理所当然必须更名。于是蒋家巷改名为“反帝巷”。

陆家巷更名为“要武巷” 陆家巷位于海安宁海北路东边,因清季时巷内有一陆梧州先生公馆而得名。清末至民国时期,原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也住在此巷。解放后,韩公馆先是海安县委办公地,后为县人武部办公所在地。“文革”时期,作为县人武部旁边的一条巷道更名为“要武巷”,也是“师出有名”的。

梅家巷更名为“新民巷” 梅家巷位于海安宁海北路西边,因清末此巷住有乡贤梅老先生,且曾出资铺设石巷道,故得名梅家巷。“文革”时期,此巷更名为“新民巷”。

唐家巷更名为“劳动巷” 唐家巷地处海安中坝路西侧,“文革”时期,此巷更名为“劳动巷”。

中坝路更名为“大寨路”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,全国各地开展轰